

·文史新探·

蔡邕《独断》考论*

代 国 玺

内容摘要:接续《汉书》十志以修成后汉之志,可谓蔡邕的毕生宏愿。而《独断》一书,就是蔡邕在其未入东观著作以前,为后日修志所作的重要准备。后来蔡邕虽得到了入东观修志的机会,可惜时运不济,未能撰成《十意》即遭横祸,至死再未能竟其事。故其所著《独断》遂不能废,反倒构成后人修续汉志的重要材料。司马彪即以《独断》为据修成《续汉志》。从《独断》来看,蔡邕诚然为修史之良才,发凡起例,史识高明,其《十意》虽未修成,但惠及后世者已多。

关键词:蔡邕 《独断》 司马彪 《十意》

蔡邕《独断》二卷,范曄《后汉书》蔡邕本传载有此书,魏晋以降著述称引者颇多,唐宋以降书录亦时有著录。此书的内容,南宋《中兴书目》有较为精准的概括,曰:“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、品式称谓,考证辨释凡数百事。”^①则此书所论之事,从时间上讲,自上古以迄汉;从内容讲,包括礼乐、祭祀、舆服、称谓、文书制度等。《独断》问世之后,曾有很大影响,晋以后言礼者,多称引其说,如晋司马彪著《续汉志》,其言礼乐、祭祀、舆服等内容,恐多以此书为据。可惜《独断》流传之际,颇生讹误,故今日所存之本,载及舆服等事,反不如《续汉志》之可读,须以后者校前者。不过,今天来看,《独断》仍有他书所不具备的价值,治汉史者如欲探究汉代文书制度、宗庙礼制及蔡邕的经学、史学观点等,皆必稽考其书,不可废之。本文试对《独断》之撰写背景、得名、版本流传、影响及价值等问题,略加考论,冀有益于读者。

* 本文系 2013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《从“制诏”到“门下”:汉唐诏令体系变迁研究》(13YHC770007) 的阶段性成果,并获得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(I-FYT12024)资助。

①《玉海》卷五十一《汉蔡邕〈独断〉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一、蔡邕撰写《独断》的时间与背景

蔡邕生于汉顺帝阳嘉二年(133),少博学,师事太傅胡广。灵帝建宁中,被司徒桥玄辟为掾属。建宁五年(172),召拜为郎中,校书东观。今本《独断》述及东汉皇帝庙号,止于桓帝,又曰:“从高祖乙未至今壬子岁”云云,壬子岁恰为建宁五年,则《独断》无疑撰成于此年。若进一步推究撰成的具体月份,则应该在建宁五年正月至三月之间。刘昭《续汉志注补》引谢承《后汉书》曰:

建宁五年正月,车驾上原陵,蔡邕为司徒掾,从公行,到陵,见其仪,忼然谓同坐者曰:“闻古不祭墓。朝廷有上陵之礼,始谓可损。今见其仪,察其本意,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隐,不可易旧。”或曰:“本意云何?”“昔京师在长安时,其礼不可尽得闻也。光武即世,始葬于此。明帝嗣位逾年,群臣朝正,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,乃帅公卿百僚,就园陵而创焉。尚书陛西祭设神坐,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。苟先帝有瓜葛之属,男女毕会,王、侯、大夫、郡国计吏,各向神坐而言,庶几先帝神魂闻之。今者日月久远,后生非时,人但见其礼,不知其哀。以明帝圣孝之心,亲服三年,久在园陵,初兴此仪,仰察几筵,下顾群臣,悲切之心,必不可堪。”邕见太傅胡广曰:“国家礼有烦而不可省者,不知先帝之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。”广曰:“然,子宜载之,以示后学。”邕退而记焉。^①

今本《独断》中备载东汉上陵祭祀之礼仪,且未尝对此有非议,则蔡邕听从胡广建议“退而所记”者,恐即在《独断》中。由此可知,建宁五年正月,《独断》犹未能撰成。又,今本《独断》中有三处称引胡广之说,皆曰“太傅胡公”,而不曰“故太傅”,如蔡邕《戍边上章》之所称,这表明太傅胡广仍健在。胡广卒于建宁五年三月,则《独断》撰成当在此前。故推定《独断》撰成的时间在建宁五年正月至三月间,应该成立。

今本《独断》一万馀字,似非完本,然唐人著录其书,亦仅言一卷而已,由此推测,蔡邕撰成之时,其书篇幅恐怕本就不长。不过,这一篇幅不长的著述,对蔡邕却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光和元年(178)七月,蔡邕遭人诬陷,被黜戍边。没过多久,他上章恳求灵帝准许他回京师修《十志》,以完成他毕生的夙愿。蔡邕说:“臣自在布衣,常以为《汉书》十志,下尽王莽而止,世祖以来,唯有纪传,无续志者。臣所师事故太傅胡广,知臣颇识其门户,略以所有旧事与臣,虽未备悉,粗见首尾。积累思惟二十馀年,不在其位,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。天诱其衷,得备著作郎,建言十志皆当撰录,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。”^②今本《独断》的主体内容,正是祭祀、车

^①《续汉书·礼仪上》注引,《后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73年,第3103-3104页。

^②《蔡中郎集》卷二《上汉书十志疏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清人严可均称《上汉书十志疏》为《戍边上章》,本文从之。

服、礼乐、朝会、称谓诸事,尤其是《独断》下卷,备载东汉祭祀、舆服之事,可知此书应该就是蔡邕所谓“虽未备悉,粗见首尾”的集结。盖蔡邕自少年时即有接续《汉书》十志修成后汉之志的宏愿,师事胡广之后,又得到胡广的赞许和帮助,故凡有所知,蔡邕必加勾稽整理,以备后用,至胡广逝世,二十年间未有废止,整理的成果即是《独断》。

《独断》虽短,却是蔡邕完成毕生宏愿——续修汉志的重要准备,凝结的是蔡邕和胡广两人的心血。蔡邕究心于此二十馀载,日积月累,自是撰《独断》的主因,然胡广的帮助,亦不可忽视。今本《独断》“高山冠”条言:“太傅胡公说曰:高山冠,盖齐王冠也,秦灭齐,以其君冠赐谒者。”“法冠”条言:“太傅胡公说曰:《左氏传》有‘南冠而縶’者,《国语》曰‘南冠以如夏姬’。是知南冠盖楚之冠,秦灭楚,以其君冠赐御史。”“武冠”条言:“太傅胡公说曰:赵武灵王效胡服,始施貂蝉鼠尾饰之。秦灭赵,以其君冠赐侍中。”此皆明确载及胡广之说以补遗漏。亦有未明确提及而实为胡广告知蔡邕者。今本《独断》曰:“旧仪,三公以下月朝,后省,常以六月朔、十月朔旦朝,后又以盛夏省六月朝,故今独以为正月、十月朔朝也。”考诸刘昭《续汉志注补》曰:“蔡邕曰:群臣朝见之仪,视不晚朝十月朔之故,以问胡广。广曰:‘旧仪,公卿以下每月常朝,先帝以其烦,故省。唯六月、十月朔朝。后复以六月朔盛暑,省之。’”^①可知蔡邕所言东汉朝会事,正是从胡广处得知的。由此类推之,蔡邕著《独断》,得胡广之助尤多,故而他有“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,略以所有旧事与臣”之言。胡广博学多闻,又历事安、顺、冲、质、桓、灵诸帝,尤明于东汉制度。蔡邕四十岁才入东观,而此前他为完成少时宏愿已有不少准备,胡广的帮助无疑是很关键的。

《独断》结构疏散,记述简略,是有原因的。详细说来,应该有三点。其一,蔡邕著《独断》,旨在记录知见以备修志之用,故性质类似于札记,结构疏散,理所宜然。其二,蔡邕以私人述论东汉礼制,所知必不如校书郎之详,记述简略,亦属正常。不过,这两点并非主因。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,修史志之事,正如蔡邕自己所说:“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。”蔡邕著《独断》,应在官拜著作郎之前,故其述论东汉礼乐、祭祀之事,是不敢用严密体制的,只能略加疏记而已,不然干犯忌讳,罪无可逃。后来,他入东观,终于等来机会能偿夙愿,遂“建言十志皆当撰录”,全身心投入《十志》的撰述,而得鱼忘筌,《独断》自无必要再续。

据光和元年蔡邕的《戍边上章》说:“臣邕初由宰府,备数典城,以叔父故卫尉质时为尚书,召拜郎中,受诏诣东观著作,遂与群儒并拜议郎。沐浴恩泽,承答圣问,前后六年。”以“前后六年”一语推之,蔡邕入东观著作,当在熹平元年(172)七月左右^②。熹平元年亦即建宁五年,是年五月乙巳改元,遂有两称。

^①《续汉书·礼仪中》注引,第3131页。

^②刘跃进:《蔡邕行年考略》,《文史》2003年第1期。

则蔡邕撰成《独断》的时间,正在其入东观修《十志》前不久。

蔡邕《十志》纲目,今能考见者,犹有其七,曰《律历意》、《礼意》、《乐意》、《郊祀意》、《天文意》、《车服意》、《朝会意》。称“意”而不称“志”,是为避桓帝刘志之名讳。而《独断》的内容恰恰都是关于这些纲目的。同时,从今日犹存的《十志》片段来看,《十志》的有些内容是直承《独断》的。《太平御览》引蔡邕《车服志》曰:“俗人失其名,故名冕为平天冠,五时副车为五帝,鸾旗为鸡翘,耕根为三盖,其制非一。”^①今本《独断》“法驾”条曰:“五时副车,俗人名之为五帝车,非也。”“鸾旗”条曰:“鸾旗者,俗人名之曰鸡翘车,非也。”“冕冠”条曰:“孔子曰‘服周之冕’,鄙人不识,谓之平天冠。”由此可见,蔡邕撰《十志》,是以《独断》为基础的。

故从时间和内容来推测,蔡邕疏记《独断》正是为异日能撰《十志》作准备,而《十志》之撰似乎也就是《独断》之辍的原因。

二、《独断》之得名

其书名为“独断”,似非后人所加,应为蔡邕所题。南朝著作屡屡提及“蔡邕《独断》”,如宋裴骃《史记集解》、梁沈约《宋书》、萧子显《南齐书》、刘昭《后汉书注补志》(本文一律称为《续汉志注补》)等,皆无异词。以此推之,大约其书始成,已有此名。以“独断”名书,颇显奇特,必有深意。

蔡邕在《戍边上章》中诉说心迹,有两个地方是很值得注意的。这两点似与《独断》的得名有直接关系。

其一,谈及未入东观而欲修汉志的心境,他说:“积累思惟二十余年,不在其位,非外吏所得擅述。”在中国古代,修撰史志常为朝廷之事,与政治权威紧密相连,皇权强大之时,私人修史每为朝廷所禁,如有发现,或加重惩。即以蔡邕熟知的班固为例,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载:“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,乃潜精研思,欲就其业。既而有人上书显宗,告固私作国史者,有诏下郡,收固,系京兆狱,尽取其家书。”“私作国史”,即属罪名,要致重罚。有此前车之鉴,蔡邕疏记《独断》,大约是不敢为外人道的,知其事且赞成其事者,恐仅胡广、蔡质等几人而已。其书题名“独断”,可能有不欲与人共的意思。

其二,谈及既入东观而修汉志的态度,蔡邕说:“先治律历,以筹算为本,天文为验,请太史旧注,考校连年,往往颇有舛舛,当有增损,乃可施行,为无穷法。道至深微,不敢独议,郎中刘洪,密于用算,故臣表上洪,与共参思图牒。”由此可知,蔡邕修志,欲其传之无穷,故态度十分严谨、客观,必与方家共究其事,才觉妥帖。“独议”一词,尤为醒目,正和“独断”同意。蔡邕得入东观,才有诸多便利讨教方家,共襄其事;而《独断》撰定于入东观前不久,故蔡邕题以“独断”,意在表明其书并非定论、共识,不过是自己的一家之言而已。此命名所反

^①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七三《车部二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映的正是蔡邕谦虚、严谨的史家心态。

故蔡邕题其书为“独断”，可能是有双重意思的，既是记录他撰写之时不敢与人共论的心境，又是以谦虚严谨的态度表明此书为自己的私人见解。

三、蔡邕《独断》与司马彪《续汉志》

蔡邕撰《独断》本为异日修汉志作准备，故其入东观，着手修汉志，取材于《独断》者应该不少。可惜《十志》未成而横祸飞至，蔡邕只能戍边朔方，虽然他上章恳请灵帝准许他回京师完成《十志》，然未见采纳。此后，蔡邕或在本郡，或流亡吴会，十二三年未至京师；及董卓剪灭宦官，辟其为掾属，随之又历任三台，然世事纷扰，不足四年即遭杀害。故光和元年（178）七月以后，蔡邕再无修《十志》的条件，诚如他向灵帝所说：“臣窃自痛，一为不善，使史籍所阙，胡广所校，二十年之思，中道废绝。”一语成谶，《十志》终未修成。魏晋南朝人看到的《十志》，应该是蔡邕给灵帝上章时附于章末的《十志》纲目大旨。《戍边上章》曰：“臣欲删定者一，所当接续者四，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……分别首目，并书章左。”《章》末附有“《律历意》第一、《礼意》第二、《乐意》第三、《郊祀意》第四、《天文意》第五、《车服意》第六”等语^①，大概就是蔡邕欲修十志中的六种。同时，每个志目之下，应该有其志的大旨。大旨虽不见于今本《戍边上章》，但南朝刘昭注补《续汉志》时曾提及，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片段。由于《十志》仅有纲目大旨，未能彻底完成，故蔡邕所著《独断》遂不能废，反倒与《十志》纲目共同构成后人修续汉志的重要材料。

据刘昭《后汉书注补志序》言：“司马《续书》总为八志，律历之篇仍乎洪、邕所构，车服之本即依董、蔡所立，仪祀得于往制，百官就乎故簿，并籍据前修，以济一家者也。”则晋司马彪撰《续汉志》，是以蔡邕著作为基础的。细绎《续汉志》，其言东汉车舆、冠冕制度，同于《独断》者颇多，甚至字句吻合者，亦比比皆是。如今本《独断》言：“古者诸侯贰车九乘，秦灭九国，兼其车服，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。”司马彪《舆服志》有此。又如今本《独断》“高山冠”条、“法冠”条、“武冠”条皆引胡广之说，《舆服志》亦并引之。再如今本《独断》“建华冠”条引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以为据，《舆服志》亦引之。其余相合若符节的例子甚多，不再枚举。无疑，司马彪撰《舆服志》是大量参考、引用了蔡邕《独断》的。关于这点，刘昭洞若观火，故其补注《舆服志》，称引《独断》多达数十处。

司马彪修《礼仪志》、《祭祀志》，亦多以《独断》为根据。《礼仪志》载“上陵”之礼、“逐疫”之仪，与《独断》颇同，应该是参考了后者。《祭祀志》言及东汉宗庙制度，字句多与《独断》相合，可能是引用了后者。如今本《独断》言：“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，后有寝，终则前制庙以象朝，后制寝以象寝……《月令》曰‘先荐寝庙’；《诗》曰‘公侯之宫’；《颂》曰‘寝庙奕奕’，言相连

^①《后汉书》卷六十下《蔡邕列传》注引《邕别传》，第2004页。

也,是皆其文也。”《祭祀志》曰:“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,后制寝,以象人之居前有朝,后有寝也。《月令》有‘先荐宗庙’,《诗》称‘寝庙奕奕’,言相通也。”很显然,《祭祀志》的这段文字完全源自《独断》,司马彪不过是稍加简练而已。整体来说,司马彪修《续汉志》,大量参考并引用了蔡邕的《独断》。刘昭言司马彪是“籍据前修,以济一家者也”,诚非妄语。有《独断》在前,司马彪修《续汉书》自然就容易很多。蔡邕著《独断》本是为自已异日修《十志》作准备,不料后半生风波不断,欲求安宁而不得,空有修成《十志》的宏愿,却至死未能完成其事,而一百年后,司马彪终以《独断》为据修成《续汉志》,完成了蔡邕未竟之事。颇有意思的是,不论时间长短、过程如何,《独断》本是为后汉之志而生,最终也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

四、《独断》的版本流传

《独断》在唐代已有单行本^①。9世纪末期编纂的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,于杂家类著录有《独断》一卷,清末姚振宗认为:“《独断》集外别行见于著录者,莫先于此。”则《独断》单行,大约是唐代之事。唐代著作称引其书者颇多,如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唐六典》、《通典》、《封氏闻见录》、《六臣文选注》等皆曾引其说。《独断》单行,或许与此有关。其书流传至宋,颇有颠错。南宋《中兴书目》载,北宋仁宗嘉祐年间,余择中“更为次序,释以己说,故别本题《新定独断》”^②,则北宋之时,《独断》已有余择中的注释本。可惜《新定独断》并未流传下来,余择中其人的生平背景也无从稽考。

南宋书目著录《独断》者颇多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五下《辅志·拾遗》著录曰:“蔡邕《独断》二卷。汉中郎将蔡邕撰。杂记自古国家制度及汉朝故事,王莽无发,盖见于此。公武得孙蜀州道夫本,乃阁下所藏。”其所见《独断》版本,详情如何,不得而知。《中兴书目》录及《独断》,其言已见前引,故不再赘述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六《礼注类》曰:“《独断》二卷,汉议郎陈留蔡伯喈撰。记汉世制度、礼文、车服及诸帝世次,而兼及前代礼乐。舒、台二郡皆有刻本。向在莆田尝得李氏本,大略与二本同,而上下卷前后错互,因并存之。”陈氏提及的《独断》版本很值得注意。左圭于淳熙九年(1182)辑刻《百川学海》,其中有《独断》,末曰:“蔡氏《独断》一编,古之制度文为类于此乎?考录本多舛,今稍是正而刻之舒泮。淳熙庚子六月初吉,江都吕宗孟书。”^③这应该就是陈氏所言舒州刻本。淳熙庚子乃淳熙七年(1180),舒泮指舒州州学,又称舒州郡学、舒州郡斋等,是宋朝江北地区最大的官刻机构之一。据“稍是正而刻之”一语来看,舒州本是吕宗孟校正旧本而成的新刻本。

①刘跃进:《蔡邕著述摭录》,《古籍整理学刊》2002年第4期。

②《玉海》卷五一《汉蔡邕〈独断〉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③《独断》,民国十六年武进陶氏涉园影刻宋咸淳初刻《百川学海》本。

陈振孙比较舒州本与莆田李氏本,觉得后者“上下卷前后错互”,可能莆田李氏本系属旧本。由于舒州本既是新校本,又出自著名的官刻机构,所以它对后世影响极大。南宋、元、明、清的丛书所收《独断》,翻刻的基本上都是舒州本。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多数《独断》单行本,字句相差不是很大,可能皆祖于此本。

元末陶宗仪辑刻《说郛》,收有《独断》一卷,其前无序,后亦无跋,不知翻刻自何本。此本与《百川学海》本颇有差别,不但在纲目的分合方面有区别,而且字句亦略有小异,似乎并非翻刻自舒州本。

明代弘治十六年(1503),湖广按察司僉事刘逊得《独断》二卷,喜其书之近古,遂命人刻之。近人张元济编印《四部丛刊三编》,所据正是此本。刘逊本之末有吕宗孟的跋语,则无疑翻刻的是舒州本。至于张元济校对《百川学海》本与刘逊本,发现“彼此互有殊异”,这应该是屡经翻刻、抄写所致。明万历二十五年(1592),新安程荣辑刻《汉魏丛书》,所收《独断》二卷,其末亦有吕宗孟跋语^①。万历间,与程荣同郡的吴琯辑刻《古今逸史》^②,亦收《独断》,其末虽无跋语,然此本与《汉魏丛书》本纲目字句每每相合,故亦当祖舒州本。

清代的《独断》版本,最值得注意的有二。一个是《四库全书》本。此版本本身并不算精良,其优点在于四库馆臣所著的提要。提要评论《独断》内容,其中不乏灼见,如论“是书多信《礼记》,不从《周官》”,又云“各条解义与康成礼注合者甚多”,皆为知者之言。而提要总体评价《独断》说:“全书条理统贯,虽小有参错,固不害其宏旨,究考证家之渊薮也。”此言亦甚是,比起卢文弨说此书“讹舛甚不易读”^③云云,要恰当得多。不过,提要亦有缺点,如其言“‘建华冠’注引《独断》曰:‘其状若妇人缕鹿。’今本并无此文。”然《四库》本《独断》之中明明有此文,不知何出此言。

另一个是卢文弨《抱经堂丛书》校本(以下简称“卢校本”)。《四库全书》本进呈于乾隆四十六年(1781),而《抱经堂丛书》本完成于乾隆五十五年,考虑到《四库》本尚未广泛流传的问题,则卢文弨校订《独断》时可能未必见过《四库》本。卢校本,辑佚正讹,远胜于其前旧本,且时至今日,亦未能有过之者。较诸旧本,卢校本有三方面的成绩。

其一,改正了旧本的许多讹误,略举数条以窥之。

诸本“秦承汉法”条皆曰:“公卿侍中尚书衣帛而朝,曰朝臣;诸营校尉将大夫以下,亦为朝臣。”这不合于汉代制度。卢校本以《续汉志注补》所引《独

①《独断》,1959年台湾新兴书局影印程荣万历初刻《汉魏丛书》本。

②《独断》,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万历初刻《古今逸史》本。

③卢文弨:《序校本〈独断〉》,《独断》,民国十二年北京直隶书局影印乾隆庚戌雕《抱经堂丛书》本。

断》为据,指出“亦”为“不”字之讹,极是。

诸本“三老”条皆曰:“天子父事三老者,适成于天地人也。”卢校本改“适”为“道”。《白虎通》曰:“言老言三者何?欲其明于天地人之道而老也。”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援神契》曰:“三者,道成于三。”^①此或系蔡邕所本,则“适成”应为“道成”之误,卢校本甚是。

诸本“守者”条皆曰:“秦并天下,置三川守,伊、河、洛也。汉改曰河南守。武帝会曰太守。”卢校本改“会”为“命”,应是。

诸本“方山冠”条皆曰:“方山冠,以五采縠为之。汉祀宗庙大享八佾乐五行舞人服之。”卢校本改“大享”为“大予”。汉明帝时,改大乐为大予乐,《续汉书》曰:“方山冠,祠宗庙,大予、八佾、四时、五行乐人服之。”故卢校本甚是。

从上举四条可看出,卢校本颇能正前本之误,大胜于前本。

其二,理顺了旧本中的某些交互颠错之处。《独断》旧本存在交互颠错的问题,关于这一点,《中兴总目》和四库提要皆曾指出。卢校本理顺了其中一处。旧本“玺印”条皆曰:“玺者,印也。印者,信也。天子玺以玉螭虎纽。古者尊卑共之。《月令》曰:‘固封玺。’《春秋左氏传》曰:‘鲁襄公在楚,季武子使公冶问,玺书追而与之。’此诸侯大夫印称玺者也。卫宏曰:‘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,龙虎为纽,唯其所好。’然则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,又独以玉,群臣莫敢用。”细绎此文,“天子玺以玉螭虎纽”一句置于“古者尊卑共之”前,颇觉突兀,文意颇显不顺。卢校本置此句于此条之末,较诸旧本通畅不少,可以为据。

其三,辑补了一些旧本散佚的内容。《独断》著成于汉末,流传至宋明,难免有脱漏。卢校本增补了数处旧本已脱的内容。如卢校本“制诏”一条曰:“制诏:制者,王者之言,必为法制也;诏,犹告也,告,教也。三代无其文,秦汉有也。”旧本皆无此条,此乃卢文弨根据《文选》李善注及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独断》增补。又如卢校本“冬至”条曰:“冬至,阳气始动;夏至,阴气始起,麋鹿解角。”旧本皆脱去“夏至阴气始起”一语,卢文弨根据《续汉书注补》所引《独断》增补。

由此可知,说卢校本远胜于旧本,并非虚誉。近人张元济影印明代刘逊本《独断》,其后有跋,论及卢校本曰:“卢抱经有校正本,视诸本差胜。”“差胜”一评,略显小家子气。此本在今天仍有重要价值,我们若想读《独断》,最好取此本;若想点校整理《独断》,亦应以此本为基础。

不过,卢校本亦有不足之处。按照校正古籍的通例,如果没有充分依据推翻旧本,旧本又还算文从字顺,就应该一仍旧贯,不必妄改。而卢文弨正讹似乎过于用力,有时颇显武断。如卢校本“大蜡”条下曰:“蜡之言索也,祭日,索此八神而祭之……祝曰:‘土反其宅,水归其壑,昆虫毋作,丰年若若,岁取千百。’”“丰年若若”一语,《百川学海》本、刘逊、《四库全书》等本作“丰年若土”,《汉魏丛书》本及《古今逸史》本作“丰年若上”,诸本皆不作“丰

^①《太平御览》卷五百三十五《养老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年若若”，且引及《独断》的前人著作也无此语，卢文弨仅仅根据汉代有“若若”一语，遂认为诸本皆讹，不免过于武断。应该说，《百川学海》等本的“丰年若土”是合适的，《汉魏丛书》等本“若上”乃“若土”之讹。“丰年若土”，是形容谷物大丰收，好似泥土那样多，故大可不必改为“丰年若若”。同时，卢文弨所作的序文也有败笔。其序文曰：“《独断》……唐人多引用之，而传者绝少。宋《崇文书目》云：‘二卷，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、品式称谓，考证辨释凡数百条，其间有颠错者。嘉祐中，余择中更为次序，释以己说，故别本题《新定独断》云。’”明眼人一看就知里面有个大纰漏。《崇文总目》完成于北宋仁宗庆历元年（1041），而嘉祐是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，起于1056年，故“嘉祐中，余择中更为次序”云云，绝不可能出自《崇文总目》。按，卢文弨所引“二卷”云云，本出自南宋王应麟的《玉海》，其曰：“汉蔡邕《独断》。《书目》二卷，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。”王氏所谓“书目”，应是修成于淳熙五年（1178）的《中兴馆阁书目》，又称《中兴书目》，《玉海》时常引及此书，如曰：“唐《步天歌》。《中兴书目》，《步天歌》一卷。”又曰：“《黄帝阴符经》。《中兴书目》一卷，分上中下篇。”卢氏未能稍加措意，遂有“崇文书目”之谬。故而我们如欲点校整理《独断》，参考卢校本的同时，也要改订此本的失误。

近代，张元济编《四部丛刊三编》时，影印了刘逊本《独断》，其末附有张元济的跋语和《校勘记》。《跋语》和《校勘记》都很有价值。《跋语》在参考卢文弨意见的基础上，指出诸本“乘輿条”所言“重轂副牽……施牽其外，乃复设牽”之“牽”，应为“辖”字，尤其精彩，值得吸纳。《校勘记》是以刘逊本为底本，校以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古今逸史》本、《汉魏丛书》、《抱经堂丛书》等本，凡有不同者辄录之。张氏互校得十分仔细，诸本字句的差异略备于《校勘记》，为今人整理点校《独断》提供了诸多便利。

张元济互校诸本，除卢校本外，其余都源自南宋吕宗孟校定的舒州郡学本，然翻检《校勘记》即能发现，诸本不但纲目分合不同，字句相异者亦比比皆是。古人有所谓“书三写，鱼成鲁，虚成虎”之言，验之于此，诚然。

五、《独断》的价值

《独断》原本是修后汉之志的准备材料，但对于今人而言，其载及东汉礼仪、祭祀、舆服等制度，反倒远不如司马彪《续汉志》详备，故其价值已不在此。今天来看，《独断》仍有重要价值，若欲探究汉代文书制度、蔡邕的史学思想和经学思想，皆必须参考此书。下面我们主要说说前两个方面。

第一，它是我们系统了解和探究汉代文书制度的不二津梁。《独断》对汉代诏令文书与章奏文书的种类、特征、功能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，我们要想探究汉代的文书制度，必须从此入手。

近年来，有几位学者对《独断》中有关文书的内容做过整理和研究，取得

了很多进展^①。不过,由于缺乏对出土简牍的关照,此类研究对《独断》仍然存在不少误读。

如《独断》曰:“章者,需头,称‘稽首上书’,谢恩、陈事,诣阙通者也。”人们往往只谈及章的谢恩功能,并未注意到章的陈事功能。应该说,章的陈事功能更为重要。武威出土的《王杖诏书册》中有平民向汉平帝诉说冤屈的上书,其起首曰“长安敬上里公乘臣广昧死上书皇帝陛下”^②。《独断》载:“汉承秦法,群臣上书皆曰‘昧死言’。王莽盗位,慕古法,去‘昧死’曰‘稽首’,光武因而不改”,则西汉时,章的起首应为“昧死上书”,故《王杖诏书册》所录平民上书,其种类属于章无疑。此章旨在诉说冤屈,乃陈事之类。其实,以《独断》为基础,再结合两《汉书》及出土简牍就可以得知,汉代以“昧死(再拜)上书皇帝陛下”或“稽首(再拜)上书皇帝陛下”起首的文书,皆属于章,吏民主要用它来向皇帝建言献策、告发大臣、诉说冤屈及表达愿望。《独断》用“陈事”一语总结,确实是言简意赅,十分准确。

又如《独断》曰:“奏者,亦需头。其京师官,但言‘稽首’,下言‘稽首以闻’,其中有所请若罪法案劾。”其所谓“但言‘稽首’”,是针对章而言的,意思是奏的起首无“上书”二字。《居延汉简》中有御史大夫丙吉给西汉宣帝的上书,其起首曰“御史大夫吉昧死言”^③;宋洪适的《隶释》中收有司徒吴雄与司空赵戒给东汉冲帝的上书,其起首曰“司徒臣雄、司空臣戒稽首言”^④,两者无疑皆属于奏。而《独断》说“下言‘稽首以闻’”,是兼有补充章的结尾格式之意的。蔡邕《成边上章》的结尾为“臣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”,灵帝时尚书令等人上奏的结尾为“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”^⑤,可知章与奏的结尾基本相同。蔡邕叙“章”时不言结尾格式,而于叙“奏”时一并言之,似乎是有意用互文的手法。《独断》介绍汉代文书,其言简意赅的特征,确实是随处可见。

随着对简牍文书的研究不断深入,我们愈来愈认识到《独断》的重要性,其对汉代文书种类的介绍既准确又全面,且言辞简约,几无费辞。可以说,我们要想系统认识汉代文书体系,舍此之外,并无他途。

①[日]大庭修著、林剑鸣等译:《秦汉法制史研究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1年,第165-287页,第502-541页。汪桂海:《汉代官文书制度》,广西教育出版社,1999年,第30-42页。李均明:《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》,文物出版社,2009年,第30-48页。卜宪群:《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》,《历史研究》1997年第4期。刘后滨:《从蔡邕〈独断〉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》,《广东社会科学》2002年第4期。跃进:《〈独断〉与秦汉文体研究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2年第5期。

②武威县博物馆:《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书册》,甘肃省文物工作队、甘肃省博物馆编:《汉简研究论文集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,1984年,第36-37页。

③谢桂华、李均明、朱国昭: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10·27,文物出版社,1987年,第16页。

④洪适:《隶释》卷一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18页。

⑤《续汉书·礼仪中》注补,第3121页。

第二,它是我们探究蔡邕史学思想的重要史料。蔡邕虽以辞章名世,但他本人的毕生宏愿却是修成《十志》。据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载:“其撰集汉事,未见录以继后史。适作《灵纪》及《十意》,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,因李傕之乱,湮没多不存。”可以说,对蔡邕而言,撰述史志的重要性可能要过于辞章之事。蔡邕所撰《灵纪》及诸列传,今皆不存。要想探究蔡邕的史学思想,依据的主要史料只能是《独断》和残存的《十志》,结合二者,颇可知蔡邕的史家风范。

蔡邕修《十志》,是有着很大抱负的。《戍边上章》言及他修《律历志》,有“乃可施行,为无穷法”之言,这颇可窥见他对《十志》期望之高。《戍边上章》又说:“臣欲删定者一,所当接续者四,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。”此言最为要紧,说的是他所修撰的《十志》与《汉书》十志有何异同。所谓“欲删定者”,指他要重写《汉书》十志中的一种。所谓“所当接续者”,指他要续写《汉书》十志中的四种。所谓“前志所无臣所欲著者”,指他要另起炉灶修撰五种志。

蔡邕“欲删定”的志,应该是《郊祀意》。蔡邕《十志》中有《郊祀意》,《续汉志注补》引蔡邕《表志》曰:“孝明立世祖庙,以明再受命、祖有功之意。后嗣遵俭,不复改立,皆藏主其中,圣明所制,一王之法也。自执事之吏,下至学士,莫能知其所以两庙之意,诚宜具录本事。建武乙未、元和丙寅诏书,下宗庙仪及斋令,宜入《郊祀志》,永为典式。”^①这应该就是蔡邕撰《郊祀意》的立意与大纲,他修《郊祀意》的特点是重视宗庙制度。又据《续汉志注补》引蔡邕《表志》曰:“宗庙迭毁议奏,国家大体,班固录《汉书》,乃置《韦贤传》末。臣问胡广,广以为实宜在《郊祀志》。去中鬼神仙道之语,取《贤传》宗庙事置其中,既合孝明旨,又使祀事以类相从。”^②由此可知,蔡邕对《汉书》的《郊祀志》很不满意,认为它有两个缺失。一是《汉书》将涉及宗庙毁立的大事录于《韦贤传》之中,而《郊祀志》略去不谈,显得体例不合,不够庄重。二是《汉书》的《郊祀志》多录鬼神仙道之事,非国家典制,宜删去。因此,蔡邕修《郊祀意》,不仅欲详载东汉的祭祀礼仪,而且欲载西汉祭祀之事,以取代《汉书》的《郊祀志》。《戍边上章》所谓“臣欲删定者一”,无疑正是指此。蔡邕最终虽未能修成《郊祀意》,但已修撰的部分,仍对后世产生影响。刘昭注补曰:“《谢承书》曰:‘蔡邕引中兴以来所修者为《祭祀意》’,此《志》即邕之《意》。”^③则司马彪《祭祀志》的内容和体例,即以蔡邕的《郊祀意》为基础。今天看来,《汉书》的《郊祀志》确实体例不纯,各种祭祀,前后杂糅,不能一目了然;言及宗庙制度过于简略,叙及武帝崇尚鬼神仙道之事又过于详备,确实不能据为修志的典要。而司马彪的《祭祀志》,条例分明,各以祀类相从,叙及各种祭祀亦详简得衷,胜于《汉书》之《郊祀志》颇多。司马彪《祭祀志》既承继自蔡邕的《郊祀意》,由此

①《续汉书·祭祀下》注引,第3196页。

②《续汉书·祭祀下》注引,第3200页。

③《续汉书·祭祀上》注引,第3157页。

可知蔡邕确实有着非凡的史学见识。

蔡邕欲“接续”的四种志,今天能完全确定的有两种,即《律历意》和《天文意》。《后汉书》注引《邕别传》中提到了《律历意》和《天文意》。《宋书·律历志》引蔡邕徙朔方上书曰:“前汉志但载十二律,不及六律,尺寸相生。”故蔡邕《律历意》显然是在接续《汉书·律历志》。又据《续汉志注补》引《谢沈书》曰:“蔡邕撰建武以后星验著明,以续前志。”^①亦可知《天文意》旨在接续《汉书·天文志》以言东汉事。另外,我们推测,《乐意》可能也属于其中一种。《汉书》有《礼乐志》,但其言礼十分简略,并无实质内容,而言乐则甚详,故蔡邕有可能将《汉书·礼乐志》视为《乐志》而已。据《北堂书钞》卷九十六《讖篇》引蔡邕《叙乐》云:“世祖追修前业,采讖纬之文曰大予乐。”则蔡邕《乐意》可能就是接续《汉书·礼乐志》的。

蔡邕欲另起炉灶修撰的五种志,我们能确定的有《车服意》、《朝会意》,《礼意》似乎也属于此类。《史通》曰:“熹平中,光禄大夫马日磾、议郎蔡邕、杨彪著作东观,接续纪传之可成者。而邕别作朝会、车服二志。”故《十意》中有《车服意》和《朝会意》。

《车服意》。《独断》对汉代车舆、冠冕制度有颇为详细的记载,大概是蔡邕著《车服意》的基础。晋司马彪撰《舆服志》,仿效的应该就是蔡邕的《车服意》。车舆、冠服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备之物,同时也是国家用以别尊卑、明贵贱的重要工具。蔡邕深知车服为国家礼制的重要内容,遂创《车服意》,欲以明往古至汉的车舆、冠服制度的变化。这种眼光是很独到的,其影响颇大。司马彪《舆服志》以降,《南齐书》、《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等正史皆有《舆服志》,而开创此体例者,实为蔡邕。

《朝会意》。《南齐书·礼志》曰:“汉末,蔡邕立《朝会志》,未就。”《檀超传》载:“王俭议云:‘《朝会志》,前史不书,蔡邕称先师胡广说《汉旧仪》,此乃蔡伯喈一家之意。’”蔡邕《朝会志》的大旨,古人不曾提及。我们根据《独断》略能窥其一二。《独断》曰:“正月朝贺,三公奉璧上殿,向御座,北面,太常赞曰‘皇帝为君兴’,三公伏,皇帝坐,乃进璧。古语曰‘御座则起’,此之谓也。旧仪,三公以下月朝,后省,常以六月朔、十月朔旦朝,后又以盛暑省六月朝,故今独以为正月、十月朔朝也。”则《朝会意》记载朝会的时间和朝贺礼仪。《独断》又曰:“朝士卿朝之法。左九棘,孤卿大夫位也,群臣在其后。右九棘,公侯伯子男位也,群吏在其后。三槐,三公之位也,州长众庶在其后。”则《朝会意》记载朝会之时群臣的位次。从《独断》来看,蔡邕修《朝会意》无疑既注重朝会时间的变化,也注重朝会议礼和班次的问题。两者都是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。自秦建立皇帝制度以来,皇帝朝会大臣的频疏,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命运。朝会频繁,则与公卿大臣议论政事多,宦官的影响就弱。而少有朝会,数月才能

^①《续汉书·天文上》注引,第3215页。

一见大臣，则宦官环伺左右，干乱国家政治。蔡邕著《朝会意》大概是有惩于后汉朝会颇疏，致使宦官手握王爵，口含天宪，既用以述汉代制度，又用以劝诫来者，用意不可谓不深。

《礼意》。我们知道，司马彪以《礼仪》立志是取法于谯周的，但据《续汉志注补》引《谢沈书》曰：“太傅胡广博综旧仪，立汉制度，蔡邕依以为志，谯周后改定以为《礼仪志》。”^①则追本溯源，司马彪《礼仪志》实际上祖自蔡邕的《礼意》。《史记》有《礼书》不为志，《汉书》虽有《礼乐志》，然言礼甚简，故蔡邕《礼意》算是独创的新体例。此体例对后世影响极大，司马彪《礼仪志》以降，《魏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隋书》等皆有《礼志》，且诸书《礼志》的内容条目基本吸纳了司马彪《礼仪志》的条目。由此可知，蔡邕的开创之功，确实是不可小觑的。

蔡邕发凡起例欲修撰的另外两种志，今天已很难知晓。但根据《独断》推测，其中有一种志可能与皇帝制度有关系。《独断》中有不少内容提及了皇帝的不同称谓，又详细记载了汉代帝系，则蔡邕曾特别注意到皇帝制度的问题，疑有就这方面的内容修志的意思。

从《独断》和残存的《十志》来看，蔡邕诚然为修史之良才，发凡起例，史识高明，其《十志》虽未修成，但惠及后世者已多。想来蔡邕的毕生宏愿在于续成汉志，时人对他的厚望也在于“续成后史”，可惜时运不济，命途多舛，终无史著流传后世，最让人感到惋惜。不过，蔡邕为修《十志》的重要准备——《独断》犹存，使人仍能察见其良史之才，倒也算是稍有慰藉了。

【作者简介】代国玺，男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。研究方向：秦汉魏晋南北朝史。

^①《续汉书·礼仪上》注引，第3101页。